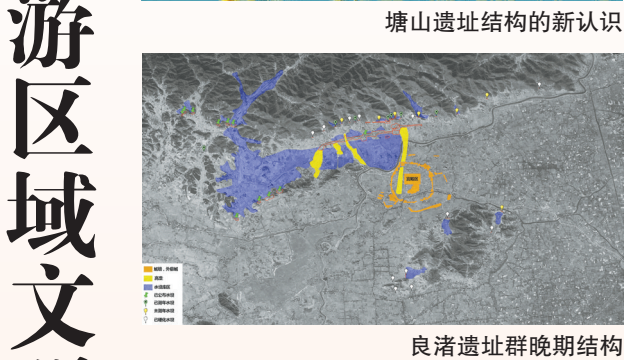


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阶段性进展



塘山遗址结构的新认识

良渚遗址群晚期结构

本课程主要针对4000BC~2000BC年间,长江下游江苏、浙江、安徽、上海“三省一市”范围内的崧泽—良渚文化开展研究,以完善对该阶段社会复杂化过程的认识,提炼总结本区文明演进模式。

经过各省学者的共同努力,通过对凌家滩、寺墩、福泉山、玉架山、良渚等中心聚落和中初鸣、磨盘墩、柘林、大榭等遗址的系统发掘和综合研究,项目取得重要进展。

对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整体进程的认识得到显著提升

首先,对从崧泽到良渚的演进发展的动因、过程有了较深认识。

距今6000年前后,长江下游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加速,出现了凌家滩、东山村等中心聚落,迈入古国时代第一阶段。随着距今5500年前的一次气候事件,促使当时人群改变了采集狩猎为主、稻作为辅的经济模式,稻作农业成为主要生业部门。因为原来周边河谷和山前的可耕地不足,而海平面稳定,导致长江带来的泥沙快速沉积,太湖平原在6000年后基本形成,经过几百年的淡化,已经成为稻作适宜区,因此导致周边人口快速向太湖平原迁徙,带来大量先进技术和观念,创造出适宜水网平原的堆城居住和稻田环绕的生产模式,促使了太湖平原腹地的快速开发。而当时因为稻作亩产不高,如果村落人口保持几十上百人的旧有规模,则维持人口所需的稻田距离过大,因此,良渚人普遍将农业生产型聚落拆分成成为一二十人的较小规模,各聚落之间的间距普遍为500~1000米,形成密集分布的聚落集群。由此创造出早期的江南生活模式,影响至今。

随着社群规模的小型化,聚落内部的个体小家庭也成为基本社会单元。如仙坛庙、普安桥等遗址发现成排分布的小土墩。这种经济独立的个体小家庭,已经出现明显的贫富分化,标志着私有制已经深入到良渚社会的最基层。

平原地区大量移民人群,面临着新的社会秩序的构建。为此,良渚社会在5000年左右完成了统一的宗教信仰和王权制度建设,据此统摄了区域内的各人群,建立了神王之国。为了强化宗教信仰与世俗权力,良渚人建立了统一的玉礼器系统,建设了各地区的礼仪和权力中心。

对各中心聚落的结构和演变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不同阶段不同环境的中心聚落显示出因地制宜的不同的模式。如寺墩等平原型中心聚落,良渚阶段体现为以主墩为中心,双重水系环绕的聚落格局。而玉架山遗址则呈现出多个环壕聚落单体围绕着一个中心,呈现出若即若离的样貌。而在良渚遗址群,聚落结构和演变更为复杂。从良渚早期到中后期聚落结构曾经发生一次革命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早期各遗址点聚落之间和聚落内部都产生了明显的等级分化,但是从规划角度看,各聚落都是利用山前地貌进行局部改造,表现出分散的多中心模式,不存在整个遗址群范围的统一规划。到良渚中期,则在遗址群空间的中心位置开始了莫角山、反山等大型礼仪空间的统一营建,这个礼仪中心与周边三面山体保持着3公里的统一距离,显示出一种居中而建的理念。与古城的建设配套,这一时期在周边几乎所有山谷谷口和平原散丘,开始统一规划建设外围水利系统。其后又营建城墙、外郭,形成结构完备的良渚古城的动态过程。这些统一规划和建设行为表明遗址群已经形成统一的实体,其建设规模和规划理念与早期阶段发生根本性转变。与这种变化相适应,社会组织结构也完成了从女性权力占优向男性权威的转化,信仰体系也从以龙形纹向统一神徽的转变,体现了早期国家社会组织产生和演变的清晰过程,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供教科书式的样本。

多学科研究大大加深了对良渚社会的理解

良渚社会存在明确的城乡分野。考古显示良渚古城城内居民除了贵族和宗教人士,多为从事玉器、漆木器、骨角器、石器 etc 的高端手工业者,而没有发现有任何农民的线索。多学科的研究也良渚古城城内没有任何水稻田。池中寺粮仓灰层中发现20万斤的炭化稻谷,其抽样DNA分析显示至少有6个产地。猪内的锶同位素分析也显示城外有3个产地。通过稳定同位素和DNA的分析,城内发现有远自中原和海岱地区的个体,显示出跨区域的人群流动。因此良渚古城是一个各类资源皆由外部汇入,人口跨区域聚集的都市,其影响力和发达程度超乎想象。

持续的研究丰富了对良渚社会多元性的认识

稻作农业的发达促进了社会分工和手工业的专业化。除城市手工业外,利用当地资源和有利条件,出现了从事农业和玉石器等专业化生产的基层聚落。如施岙和茅山遗址都发现大规模农田;中初鸣遗址群则集中从事低端玉器生产。处于分水江河滩的方家洲、沈家畝等遗址,则以石器的粗加工为生业,从而使良渚基层聚落呈现出复杂的多元性。

东山村遗址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金港街道东山村,西依香山,北望府山,北距长江约4公里。该遗址东西长约700米、南北宽约600米,遗址面积近38万平方米,是一处以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堆积为主的新石器时代大型遗址。

东山村遗址于2008~2010年进行了新一轮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尤其是首次在长江下游揭示出一批崧泽文化早中期高等级大墓,并且高等级大墓与同时期小墓实施分区埋葬,是目前所见长江下游乃至国内史前社会阶层明显分化的最早例证。

2023年以来,围绕明晰遗址内部布局和确认遗址宏观结构两个方面开展了对东山村遗址的主动性考古发掘。2023年度批准发掘面积500平方米,2024年度批准发掘面积600平方米。共发掘新石器时代大型红烧土堆积4处、墓葬17座、房址1座、灰坑20座、灰沟1条、水井1口、柱洞3个。

2023年发掘区分为两处。一处位于原南沙办事处院内,在2008~2010年发掘Ⅱ区北部布设了T1211、T1212、T1311和T1312四个探方,揭示出一片崧泽文化时期的重要遗迹现象。该发掘区中南部发现一大面积红烧土堆积,平面呈呈长方形,东西两端略直,方向近正北,南北长约11、东西宽约8、厚度约0.2~0.4米。在烧土堆积周围清理了若干红烧土坑,坑内出土有完整陶器和玉石器等,该组遗迹或与祭祀行为有关。同时,在红烧土堆积周围,还揭示出了10多座崧泽文化大中型墓葬。本次发现的大中型墓的规格与2008~2010年西区发现的大中型墓葬基本相当。例如M115,墓口长2.73、宽1.68~1.74、残深0.45米,出土随葬品31件,陶器22件,玉器多达9件。M118,墓口长2.7、宽1.24、残深0.62米,出土随葬品21件,其中石器10件,陶器11件。从墓葬中的陶器分析,墓葬年代集中于崧泽文化早期偏晚至中期阶段;另一处发掘区位于遗址南侧边缘,从老卫星航片分析遗址外围存在有一周环形水道,推测可能是遗址的环境所在。本次发掘利用长探沟对该处进行解剖,由于河道较深,考虑安全暂停发掘。2023年度在原发掘Ⅱ区北侧再次清理了一批崧泽文化高等级墓葬、红烧土广场和红烧土坑,显示该区域可能存在有祭祀区与另一处高等级墓地。

2024年的考古工作在2023年度发掘区的西、北、东侧展开,一是摸清红烧土堆积的分布范围,确认是否存在其他房屋建筑或祭祀遗迹;二是以新发现的M115等崧泽文化早期大中型墓葬为线索,继续了解本次揭示的崧泽文化高等级墓地分布范围及其与此前发掘高等级墓地之间的异同和关系。经过发掘,本年度又发现3处成片的红烧土堆积和4座崧泽文化大中型墓葬。其中,M126墓口长2.9~2.92、宽1.68~1.71、残深0.45米,出土随葬品37件,其中玉器17件,陶器20件;

寺墩遗址位于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郑陆镇三皇庙村,北距长江约15公里,南距太湖约30公里,原是一个高出地表约20米的椭圆形土墩,东西长100米、南北宽80米,由于取土破坏,现已残存墩体南坡。遗址周边水系发达,有内、外两重环形水系,寺墩墩体恰好位于水系的中心,外圈水系大致围合面积约150万平方米。遗址东南5公里处,遥见一片海拔高度在100米上下的低山丘陵。

寺墩遗址于1973年发现,1978至1995年陆续开展了五次考古发掘,发掘位置主要集中在墩东良渚文化贵族墓地,尤以寺墩三号墓最为著名,出土大量玉琮、玉璧,学界认为寺墩是良渚文化的中心遗址之一。2019年正式重启发掘,工作重点集中于墩体周边的核心区域,现将近几年重要收获简介如下。

重要发现

本次考古发现的重要遗迹包括崧泽文化墓葬区、木构建筑遗存和良渚文化砺石遗迹、建筑基址等。

崧泽文化

墓葬区 位于寺墩墩体北侧台地(简称墩北台地),其中台地北部为贵族墓地,目前共清理墓葬四十座,均为竖穴土坑墓,墓向分为东西和南北向,少数残存头骨、牙齿、肢骨,应为单人仰身直肢葬,个别墓葬可辨棺痕。随葬品以陶器为主,以鼎、豆、杯、壶、罐等为基础组合,常见钺、钺等石器,少数随葬璜等玉器。在台地西部清理墓葬8座,随葬品3~5件,分布集中,规模较小,等级较低。

M63开口于③层下,打破④层。长262、宽84、深64厘米,墓向3°。随葬品27件,其中玉璜1件,陶豆最多,共12件,形制各异。

M88开口于②层下,打破④层。长225、宽85、深98厘米,墓向10°。随葬品33件,其中玉璜1件,陶豆8件,陶壶6件。

M95开口于③层下,打破⑤层。长285、宽125、深70厘米,墓向7°。人骨保存一般,可辨葬式为单人仰身直肢葬。棺痕较明显,棺长223、宽87厘米。随葬品24件,含玉璜1件、鼎、豆各5件。

木构建筑遗存 位于墩北台地东缘,开口于TG2②层下,东西长度近30米。对该遗迹进行了局部解剖,木构建筑表面为细密的植物茎秆,经鉴定其中含有竹子;植物铺面下为排列整齐的横木;另有多排立柱呈东西向分布,木柱直径多在10~20厘米。已探明植物铺面南北宽约10米,初步推断这是一处由立柱、横木、植物茎秆铺面组合而成,面积约300平方米的建筑遗存。

良渚文化

墩体堆积 墩体残高11.8米,经铲切剖面确认④层以下即为良渚文化堆积。墩顶发现多条红烧土基槽,基槽宽约40厘米,深约10厘米,表明曾有大型建筑;墩体堆积呈由西向东、由南向北的倾斜状;墩底由青灰色“草包泥”堆筑而成,初步明确了墩体营建过程。

砺石遗迹 墩体北坡下发现一处砺石遗迹,开口于①层下,呈东北—西南走向,有基槽,石块集中填埋在基槽内。结合局部解剖和勘探结果,砺石遗迹东西长约80米,宽70厘米,深30厘米,砺石均为棱角分明的角砾,可能来源于遗址东南部低山丘陵。砺石遗迹处于墩体北界坡脚处,可能作排水或护坡之用。

建筑基址 墩体北侧TW06N28内发现一处良渚文化的建筑基址,东西走向。目前已清理墙基长9米,宽0.4米,继续向西延伸。墙基底部有大量红烧土块,红烧土块内掺和了稻属等禾本科植物,有木骨痕迹,待进

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

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M125墓口长2.8~2.86、宽1.68~1.71、残深0.55米,虽然墓葬的东南部为南沙政府盖楼时所打破,随葬品仍然出土了有39件,其中玉器3件,陶器36件,从陶器形制分析,属于崧泽文化晚期,填补了崧泽文化晚期大墓的空缺,完善了年代序列。

东山村遗址2023年以来开展的主动性考古发掘,揭示出遗址核心区北部仍然分布有崧泽文化时期高等级墓地,上述发现突破了以往对遗址内部墓地布局的认识。即崧泽文化时期的高等级墓地范围由原西部的600平方米,向东扩大了1500平方米,东山村崧泽文化高等级墓地的范围现在2000平方米以上。从目前揭示的情况看,整个崧泽文化墓地的范围东西长150米以上,南北宽90米以上,整体面积在13000平方米以上。

同时,2008年至2010年的发掘中,只揭示出了崧泽文化早中期的高等级大墓,而未发现崧泽文化晚期的大墓。本次崧泽文化晚期高等级大墓M125的发现,则填补了环太湖流域没有该时期大墓的空白,为聚落的发展演变及社会发展程度的认识新增了重要资料,进一步彰显了东山村遗址在崧泽时代从早至晚长时段的兴盛与发达。

本次新发现的祭祀广场及祭祀坑等相关遗迹现象,则是东山村遗址的首次发现,是崧泽文化早期史前礼制萌发和社会复杂化发展的高度表现,为阐释东山村遗址阶层分化、礼制发展和文明加速发展的形态和模式提供了重要资料。

2023~2024年度考古新发现再次实证东山村遗址是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代表性遗址,是研究长江下游早期古国文明的典型遗址。东山村遗址目前揭示出了崧泽文化高等级墓地、大型房址、红烧土祭祀广场、祭祀坑以及大型墓葬与小型墓葬实施分区埋葬等重要遗迹,显示出存在有高于一般聚落且稳定的政治实体,社会已进入古国阶段,对深化古国时代的认识、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崧泽文化早期大墓M115

一步揭露。

墩东良渚文化贵族墓葬区 通过近年考古发掘和综合研究,基本明确墩东良渚文化贵族墓葬区的整体布局,墓葬区共有两处良渚文化贵族墓地,均位于寺墩墩体东侧面面积约5000平方米的台地上(简称墩东台地),1982M3所在墓地位于台地东北部,另一处墓地位于台地东南部。台地东、北、西三面均为低洼地,G17是台地界,出土有“日月山”等刻符的大口缸残片,是环太湖与海岱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即存在密切联系的例证。

出土遗物

崧泽文化陶器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红陶为主,另有少量黑皮陶。常见鼎、杯、豆、釜、罐、大口缸等器型,以外“T”型鼎足、横截面呈“十”字形的鼎足为特色,流行圆形、三角形镂孔豆,花瓣足杯,篮纹大口缸、折腹壶等。石器以石钺、石斧、石磨居多,玉器有半璧形玉璜、玉镯等类型。出土6件精美彩陶壶,施黑、红、黄三彩,绘成绞索状编织纹、条带纹等,其中J1③:4纹饰最为繁复精妙,它通体施彩,底色墨黑,长颈为砖红色,上腹部用墨黑、砖红和棕黄三色绘制出两只相连的编织纹卷尾鸟形象。经检测,颜料中含有大漆成分,黑色为石墨,红色为铁矿石。

良渚文化时期陶器以泥质灰陶、夹砂红陶、橙黄陶为主,另有相当数量的黑皮陶。器型以袋足陶鬲最具特色,数量较多;带鬃格的侧扁足陶鼎和粗篮纹大口缸流行;宽把杯、贯耳壶、双鼻壶也较为常见。玉器种类较多,包括玉璧、玉琮、玉锥形器、玉管等。良渚文化G17中出土的一批刻符大口缸尤其值得关注,刻划有“日月山”、鹿角、圆圈纹等符号。

相关认识

崧泽文化时期墓葬贫富差异悬殊,显示出较高程度的阶级分化,是环太湖地区史前考古的重要发现;木构建筑遗存规模大,保存好,结构复杂,较为罕见;墩东台地水井中出土的漆彩陶器,构思精巧、工艺高超,是复杂社会分工和手工业专业化的缩影。良渚文化时期,堆筑了规模宏大的寺墩墩体,大型红烧土基槽表明寺墩顶部曾存在大型建筑;墩体北侧大型建筑基址、灶、灰坑等遗迹表明这里曾是良渚文化时期聚落核心区。

寺墩是距今5500~4500年连续发展的中心聚落遗址,面积超百万平方米,对双重水系结构和台地性质的初步探索,有助于深入认识寺墩遗址的聚落格局;通过对寺墩墩体周边区域的发掘,有助于进一步厘清距今5500~4500年间考古学文化演进过程,了解遗址核心区的功能布局。本次考古发现表明寺墩遗址在距今5000年前后即已呈现出较高的社会发展水平,并逐步走向繁荣的良渚文明,为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为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有力证据。



寺墩遗址崧泽文化陶器

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铜闸镇长岗村,东距长江25公里,西距巢湖30公里,遗址北望太湖山,南临裕溪河,坐落于太湖山向南延伸的十里长岗的南端及两侧平地上,海拔6~25米。是一处距今5800~53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心聚落遗址,总面积约160万平方米。

遗址于1985年发现,先后于1987、1998、2000、2007年进行5次发掘;2008年以来持续进行系统的调查、勘探,并于2013~2017年进行5次发掘。初步确认遗址有内、外两条壕沟。内壕与裕溪河形成一个封闭的空间,内壕以内是主要的生活区,面积近50万平方米。外壕仅有西段和北段西部。内壕以北为墓葬区,处在岗地的最高点,以一处略呈方形的祭坛为核心。在祭坛之上和周边,分布着数十座墓葬,随葬品以玉石器为主,比较有代表性的玉器有人、龟、版、鹿、龙等。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0~2024年,凌家滩遗址发掘地点主要有三处:一处位于岗地东南端的大型公共建筑地点;一处位于外壕北部缺口处;一处位于墓葬区西侧地点。总发掘面积约4000平方米。

大型公共建筑地点

位于岗地东南角、内壕中部,以大面积的红烧土堆积为特点。

该红烧土分布范围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88米,东西宽40米,边界较直,东北角被明清堆积破坏,现存面积约2700平方米,复原总面积约3400平方米。中部红烧土堆积普遍厚1.5米,堆积中包含少量陶片和大石块。

红烧土底部各区情况不一,以全面清理发掘的北部为例,西北部红烧土堆积较薄区域底部为一房址。

红烧土西界外侧区域推测应为平行分布于红烧土西侧的大型建筑台基,其与红烧土遗迹共同组成一处超大型的公共建筑基址,总面积约5500平方米。

通过2020~2022年2000平方米的揭露发掘,确定了该大型红烧土遗迹的范围、结构、堆积和年代,初步认为该大型红烧土遗迹年代为凌家滩文化最繁盛的时期(距今5500~5350年)。红烧土堆积下层和西侧存在一处大型的公共建筑基址。

外壕地点

为配合外壕遗迹保护展示项目建设,同时为了解外壕北部缺口是否有防御设施以及外壕的具体结构,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1年12月至2022年5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区域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739平方米。

发掘结果显示,外壕位于凌家滩岗地北端的北侧,紧邻岗地,外壕口宽45米、底宽25米,自深2米,底部有厚达0.2~0.5米的凌家滩文化晚期陶片。南侧即为岗地,且岗地堆土里包含有碎石块,应为开挖外壕向南侧堆土而成。岗地与外壕的落差达6~9米,再加上较宽的外壕,能起到积极的防御功能,同时,外壕还能起到蓄水和垃圾倾倒场所的功能。

墓地西侧地点

为了解墓葬区周边遗存情况,2021年10月至2024年12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墓葬区西侧地点进行发掘,发掘面积约1200平方米。

共发现新石器时代灰坑2个、祭祀坑1个、汉代墓葬5座。出土文物400余件,其中绝大部分出自祭祀坑,主要是石器、玉器 and 少量陶器。

祭祀坑是本次发掘的重要发现。平面形状呈圆角长方形,南北长4.1米,东西宽3.5米,深度32厘米。填土上部是大量的火候极高的红烧土块,之下为大量的残碎的石器、少量玉器和陶器,共出土器物260余件,其中石器140余件、玉器70余件、陶器40余件。

石器以钺占绝对多数,拼合后完整石钺60余件。其中一件长38.3厘米,上宽24.3、下宽28.5厘米,为凌家滩目前发现的体量最大的石钺。

玉器多为残碎小型饰品,有少量新器形,如齿轮形器、椭圆形牌饰、梳形器等。其中一件龙首形玉器造型奇特,工艺精湛,一端阴刻出猪龙首形,略上翘,另一端为尖锥形。

陶器有杯、鬶、鼎、大口尊等。其中2件彩陶葫芦形壶较有特色。

此外,为了解祭祀坑周边遗存情况,对祭祀坑西侧岗地斜坡及西侧平地区域均进行发掘,了解到该片区存在较丰富的文化层堆积区,包含大量的陶片,推测应为在岗地上部进行祭祀活动时倾倒垃圾之处。同时,在堆积的南侧和内壕之间,发现有大面积的石子青泥层堆积,推测可能为开挖内壕时的沟底堆积堆筑在此,兼具道路和活动场所功能。

通过本阶段发掘,了解了墓葬区西侧同时存在一处重要的祭祀场所,扩大了墓葬祭祀区的范围,证明整个岗地中部区域都是事先有着统一规划的墓葬祭祀场所。

价值和意义

凌家滩祭祀遗存的发现,为研究复原当时祭祀场景提供了鲜活的资料,完善了对墓葬祭祀区布局的认识;200余件器物的出土,丰富了凌家滩陶器玉器的种类;龙首形玉器等特殊玉器的出土,对研究中国史前用玉制度及对历史时期礼制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以大型红烧土遗迹为代表的大型高等级公共建筑的发现,深化了对凌家滩聚落布局的认识;证明凌家滩存在超大型的高等级的公共礼仪建筑,并且存在明确的祭祀功能;为大型墓葬、精美玉器的存在寻找到了相匹配的高等级的生活遗存。

作为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代表,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中的关键节点和关键地点,凌家滩的考古新发现和研究进展,为深入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关键性的资料。



红烧土遗迹范围(上为西北)

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